



1.1 话题的缘起

1.1.1 性别、女性主义与男性气质

一个婴儿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其生命就已被打上性别的烙印。无论什么人，“出生的第一刻被告知于世的第一个身份就是性别”（李小江：177）。性别是个体“最基本、最具实体意义的身份本源”（Jeffers：4）¹，“对于性别差异的尊重就是对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尊重”（刘岩：160）。性别不仅是“思考我们人性的一种主要方式”（帕森斯：17），也是深入理解诸多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因为“当今世界上诸多问题其实都可以从男女两性的关系上找到问题的源头”（刘永杰：19）。可见性别是人类一大基本命题。对于人文社会学者而言，关注性别问题，至少不轻视和排斥性别问题，是其社会责任感和现实关怀的一大体现。正如著名男性气质研究学者康奈尔所强调的，“如果没有对性别不断深入的理解，我们也不能理解阶级、种族和全球性的不平等。性别关系是整体社会结构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性别政治则是我们集体命运的主要决定力量之一”（康奈尔：104）。在文学研究领域，性别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研究视角，“不仅丰富了文学

1 文中引用部分为本书作者所译，故参引括号内仍保留引用作品作者的原名。本书此类引用参照此做法，不再特别说明。



书写与文学解读，而且使文学特有的人文精神有更加具体的表达”（刘岩：157）。

然而人类早期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女性和女性气质的问题，男性和男性气质的问题迟迟没有成为研究对象。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大多数历史时期，男性就等同于人性，mankind等同于humankind，男性法则就是人类法则。就此而言，“男性成了人类的标准，这一标准也成了衡量女性的尺度，因此男性不像女性那样富有性别意味”（Gregg：2）。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人会写一部有关‘男性历史’的书籍，因为‘女性’才是反常的历史范畴，而对男性则没有必要去特意解释”（布劳迪：5）。人们认为只有女性才是有性别的群体，女性的问题才值得被审视和研究，而男性的性别身份则被其表面的普遍性所遮蔽。正如杰弗斯所言，“男性气质通过让自己貌似具有某种规范性和普遍性而竭力让自己不留痕迹”（Jeffers：2）。

因此男人似乎成了一个无性别的物种，其性别身份变成了一种隐秘的存在。著名的男性气质研究学者金梅尔对此深有感喟：“身为一个中产阶级的白人男性，我没有阶级，没有种族，没有性别”（Kimmel, 2006：3）。在这种情况下，早先的性别研究其实就是女性研究的代名词。即便在当今世界的很多文化和地区中，性别研究实为女性研究的现状依然没有改变。

不可否认，此起彼伏的女性解放运动，一波又一波的女性主义思潮，都大大促进了女性权力和身份意识的觉醒，推动了两性的平等，让更多女性走上自立自强的道路，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然而，性别毕竟是由男性和女性构成的，对男性问题的忽略必然会导致人类对性别议题认知的片面和残缺，正如龚静所言，“女性主义评论家仅仅将注意力集中在女性一方身上，必然不能真实、全面地反映整个男女权力关系的图景”（龚静：67）。长远来看，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忽略既不利于女性问题的解决，也不利于两性平等的真正实现。性别问题并非仅仅通过宏大的政治运动就可解决，而对男性气质的正确认知和实践对于两性关系的平等与和谐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加强男性气质研究，让性别研究走向平衡，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彼得·布鲁克（Peter Brooker）认为，“把‘性别研究’与女性主义相提并论会倾向于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女性的表征方面。但显而易见的是，性别对于男性气质观念认知的重要性与日俱增”（Brooker: 111）。就此看来，男性气质研究的兴起是历史的必然，既是时代所需，也是性别研究的健康发展所需。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化和拓展，人们愈发意识到男性气质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这一过程中，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对男性气质研究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激发和推动作用。首先，在一波又一波的女权主义运动和思潮的冲击下，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性别属性得以显现，再也无法以人类的普遍性自居，逐渐从隐在变成显在，从幕后走向台前，被放大在聚光灯下，成为大众凝视（gaze）、评判甚至批判的对象和问题性概念（problematic concept）。其次，女权主义运动还激发了人们对男性气质的兴趣：“在女性解放和同性恋解放运动对男性气质的社会性批判之下，有关男性气质的讨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呈现出一种新的风貌”（Connell: 7），这种对男性气质的兴趣和讨论逐渐演变成男性运动，对男性气质研究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最后，女性主义思想也为男性气质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明确的研究性别与文化始于女性运动，女权主义作为一门学科已经成为性别以及随后出现的男子气概研究的理论基础”（金梅尔、梅斯纳：569）。事实上，女性主义理论对康奈尔等男性气质研究学者的文化立场、学术态度、运思方式等的确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男性气质的研究走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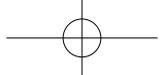
1.1.2 男性气质危机

男性气质几乎从出现的那天起就与男性气质危机（crisis of masculinity）联系在一起，后者是男性气质研究兴起的一个重要现实驱动力。蒂姆·埃德华兹（Tim Edwards）把男性气质危机分为外部危机（crisis from without）



和内部危机 (crisis from within)。外部危机主要指男性在“工作、教育、家庭、性生活、健康、犯罪和表征”等方面的危机 (Edwards: 7), 尤指在家庭、教育和工作等领域优势地位的丧失。大量数据表明, 男性发生暴力冲突、犯罪、自杀等极端行为的比例远高于女性, 其身体健康状况也不容乐观, 患高危疾病的概率也远大于女性 (Beynon: 76-79)。内部危机往往比较隐秘, 很容易被忽略, 主要指男性对其性别身份和男性气质的焦虑, 尤指男性的“无力感、无意义感和不确定感” (Edwards: 6)。不可否认, 有些危机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和外在性, 比如经济萧条时失业给男性带来的冲击等, 但错误或扭曲的性别身份观念在诸多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同样值得关注。一方面, 现代男性气质的定义和评判标准本身就存在严重的问题, 正如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那样, “男性气质有着潜在的暴力和消极因素, 缺乏传统男性气质所承载的积极品质” (Kimmel *et al.*: 40)。可以说, 现代男性气质对男性的权力、财富、身体、性等外在价值取向的片面强调是导致诸多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 在现代社会, 以上这些男性气质评判标准与男性在诸多空间和领域日渐“去势”的现状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错位, 这会导致男性心理和人格的创伤、扭曲和异化。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来, 男性气质大体上经历了以下三次结构性的危机。

第一次男性气质危机主要出现在小生产者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时代的变迁让很多习惯于传统农业和手工业的男性备感压抑, 大工业生产让他们感觉丧失了对自己生命和生活的掌控力, 感到孱弱和渺小。著名的小说家舍伍德·安德森 (Sherwood Anderson) 敏感地认识到这一点, 感慨现代男性在机器面前感到迷惘和无能。在大工业生产中, 机器主宰了一切, “机器让我感到非常渺小。对我而言, 它们太复杂, 太让人眼花缭乱了。我的男性气概还不足以和它们分庭抗礼。它们干起活来又好又快” (转引自 Kimmel, 2006: 132)。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 男性的这种“去势”感更为强烈, 感觉自己变成了可以被随意摆布的棋子。



迅猛的工业化进程、科技的日新月异、资本的集中、城市化和移民——这些因素合在一起让人有一种压抑、拥挤、没有个性、被阉割的感觉。男性气概曾经意味着独立自主和自我控制，但现在越来越少的美国男人能够拥有自己的店铺、控制自己的劳动、拥有自己的农场。越来越多的男人在经济方面失去了独立性，受制于时钟的统治。（Kimmel, 2006: 58）

这显然是一种结构性的危机，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和群体性。可以看到，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剧，男性在生理和体能等方面的性别优势逐渐消失，男人展现自己男性气质的社会和文化资本也非同以往，不论是在内在精神品质方面还是社会地位方面，男性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困境和挑战。

需要指出的是，在早期工业社会，虽然男性的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例如很多男性从原来的小农场主或手艺人变成了工厂工人，但主流社会依然奉行生产主义（producerism）价值观。男性气质的评判标准主要还是男性的人格、德性以及各项素质和技能，创造财富和保家卫国的能力，和对家庭、部族或社会的贡献，而男性在体能和生理等方面的优势也仍然存在，有利于其在家庭和社会中实现自己的价值。也就是说，这一次男性气质危机至少在价值观和传统男性气质方面保留着一定的连贯性，没有完全让男性堕入价值虚无的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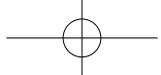
第二次男性气质危机主要出现在从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的历史阶段。随着工业革命的迅猛发展，西方社会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了这一转型，与之相伴的是男性价值的变迁，即从生产主义文化价值观蜕变为消费主义文化价值观。在这一历史阶段，“早先让勇武的工匠们深受鼓舞的诸如节俭、努力工作和奉献等传统生产主义理想和品德，现在已经非常缺乏”（Kimmel, 2006: 72）。男性证明其男性气质的舞台也发生了改变，从生产领域转向消费领域，这也让男性气质再次遭受冲击。在消费文化时代，“身份不再凭靠个体的为人处世来获得，而更多地依赖一个人的外表



和生活方式” (81)。很多男性无论在心理和精神层面，还是在现实生活层面，都变得无所适从，感到空虚和迷惘。“在十九世纪最后几十年里，人们普遍认为男性气质陷入了危机” (52)。弗朗西斯·斯科特·菲茨杰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的《了不起的盖茨比》(*The Great Gatsby*) 以及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都真实地反映了美国二十世纪初消费时代的男性生活和精神状貌。值得一提的是，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男性气质在文化价值观方面的蜕变还体现在概念的更换上：manhood 这一传统男性气质概念被 masculinity 这一现代男性气质概念所替代。

Manhood 以前一直被用来界定一种内在品质，一种独立自主的能力和责任感，并且在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与 childhood 相对的词。成为一个男人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某些时候，一个成熟的男孩会向世人证明他已经成为一个男人，已经把孩子气的东西丢在一边。在二十世纪开始之际，manhood 逐渐被 masculinity 代替，后者指的是与 femininity 相对的一套行为特征和态度。男性气质是需要不断展示的东西，个体要不断质问自己是否拥有男性气质——以免因给人太女性化的印象而让自己名声扫地。(Kimmel, 2006: 81)

随着后工业社会和消费时代的到来，男性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正如许多评论家和社会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男性气质、性别和性方面的话语危机在十九世纪末出现了” (Roberts: 3)。在以消费和娱乐为主导的后工业社会，无论在权力、金钱还是社会地位方面，男性都已经毫无优势可言。以往的男性气质观念和规范与男性的实际生存境遇之间产生了严重的错位，男性气质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如胡佩尔所言，“西方支配性男性气质理想全线崩溃，或者至少承受着来自全球化、经济重组、男性作为消费者的定位、家庭结构的变迁等方面的压力以及来自女性主义、同性恋、后殖民等方面的政治挑战，而这些还仅仅是‘后现代性语境’中的几



个因素而已”（Hooper: 67-68）。在这种情况下，男性气质也越来越难以证明，男性愈发难以实现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期待，随之而来的则是压力、焦虑甚至恐惧，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男性气质危机”，这也是男性气质最终在二十世纪中后期成为一个正式学术研究领域的现实驱动力。无论人们采取怎样的态度和立场，有一点必须承认，那就是男性气质已经浮出水面，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性别问题。

在后工业消费社会，随着生产主义到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变迁，随着很多男性从生产者到消费者的身份转变，男性的休闲和消费在男性气质的评判、建构与实践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休闲和娱乐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与其说是对艰苦工作的一种奖赏和回报，倒不如说其自身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Ging: 162）。在消费和娱乐主导的后工业社会，男性发达的肌肉和健壮的体魄已经没有用武之地，男性的体能优势不复存在，男性气质借以建构和实践的现实基础也不再稳固。

第三次男性气质危机主要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后期，随着大众传媒、网络资讯和信息时代的到来，男性在农业和早期工业社会的优势荡然无存，男性气质陷入更为严重的心理和现实困境。但与之相悖的是，社会习俗和大众观念并没有因此降低对男性的要求。在大众心目中，男性依然是养家糊口者，是家庭的经济支柱。在这种情况下，男性的总体“去势”与社会对他们的性别期待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错位，正如玛莎·麦考伊（Martha McCaughey）所言，“当今社会鼓励男性将自己的男子气概视为有力、多产甚至是进攻性的——其实在新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那些催生这些特质的机会早已悄然逝去”（转引自金梅尔、梅斯纳：5）。这种错位往往会给男性带来压力和严重的心理焦虑，甚至导致其人格的扭曲。而女性的崛起和女性主义思潮对男性和男性气质的挑战和冲击，让很多男性感到愈加颓丧和无所适从。

另外，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商品化和物化，让传统的男性品德和诸多优秀精神品质备受轻视和贬低。在当今消费时代，男性的消费能力已经成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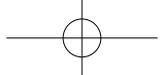


衡量男性气质的一项重要指标，娱乐明星成为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偶像和英雄，而这些明星往往以一种炫目的消费符号出现，借助他们的偶像效应，不断刺激着人们，尤其是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同时也不断强化着消费能力在男性价值评判中的重要地位。在这种文化价值观的引导下，男性的内在精神品质和道德素养已变得不再重要，男性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消费能力以及对他人和社会欲求的满足程度，男性能否买得起房子、车子和高档奢侈品已经成为其男性气质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这也让很多年轻人感到无力，甚至产生严重的价值危机和道德虚无感。久而久之，很多男性放弃了自己的人生理想，不再致力于道德素养的提升和人格的完善，而是随波逐流，磨平了棱角，成为人们口中的“油腻男”或“圆滑男”。对男性气质体系中物质因素的过度强调，给很多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差的男性带来了相当大的压力和焦虑，让由来已久的男性气质危机更加严重。

社会和现实生活中愈演愈烈的男性气质危机让人们对于男性气质本身产生了质疑，把这个潜在的性别身份概念从幕后推向了台前。从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男性气质话题逐渐进入大众视野，成为人们讨论和研究对象。其中，性别角色 (gender role) 是讨论最多的问题之一，也成为男性气质研究初始阶段的一个主要视角。

1.1.3 男性运动的出现与男性气质研究的兴起

到了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上述男性气质危机更为严重，男性失去了在各个领域的性别优势。另外，女性意识的崛起以及女性主义的兴起，尤其是第二波女性主义浪潮，让男性和男性气质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男性气质的兴趣更加浓厚，对男性气质的讨论更加广泛，讨论范围“已经触及健康、社会福利工作和教育领域，并且开始对这些领域中的运行机制产生影响” (Connell: 7)。而且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在美国等西方社会出现的以解放男性为主旨的男性运动 (Men's



Movement)对现代男性气质进行了深刻反思,认为“男性气质具有破坏性,驱使着男人在对成就、权力、特权和利益的追逐和痴迷中走向毁灭”(Beynon: 15),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走出男性气质危机的一些设想。可以说,这场男性运动对现代社会的一系列反思和重构对男性气质研究的兴起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美国,罗伯特·布莱(Robert Bly)就是一个典型代表。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发起和领导的“神话诗学运动”(Mythopoetic Movement)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响,标志着美国“男性运动”的诞生,而其颇具影响力的著作《铁约翰:一本关于男人的书》(*Iron John: A Book About Men*)则堪称该运动的宣言书。通过各种思想动员和实践活动,布莱致力于“激励男性重新唤醒他们之前一直被压抑的‘野性’”(Brooker: 159),以重塑男性阳刚之气的方式来应对男性气质危机。突然间,“遍及全国的男人们在周末成群结队地走入森林,在那里击鼓吟唱,完成仪式,缔结友谊,并且以此发现自己内心的狂野,重新获得内心深处的男性气质”(Kimmel, 1995: 4)。在女性主义思想大行其道、女权运动风起云涌、男性气质备受诟病和打击的时代,布莱和他的追随者们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所倡导的男性运动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很容易给人一种试图恢复男权主义和父权体制的假象,而且这场男性运动也确实遭到部分社会人士,尤其是激进的女性主义者的质疑甚至敌视。

实际上,布莱发起的男性运动并不完全是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击,其目的也并非维护男权思想和父权制以及对女性的统治和压制,而是对男性所经历的种种精神和现实困境的反思,因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男性自我救赎的运动,目的是恢复被现代性和消费文化价值观所遮蔽的男性内在品质和精神力量。这一点已经引起个别学者的注意。金梅尔认为,“男性运动假定了一种深层次的、本质性的男性气质,重获这种男性气质是解决问题的方法。男性气质被看作一种深层次的本质,一种根深蒂固的品性,等待着在社会中被激活。由于它是每个男性的内在品质,所以具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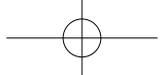


超历史性和文化普遍性” (Kimmel, 1995: 21)。在一个几乎把男性气质完全禁锢在性别政治和权力关系等思想和话语牢笼中的女性主义和后女性主义时代，布莱和其追随者们这种看似“不识时务”的思想和举措实际上是颇具灵魂高度和超越性的；它有利于把人们的思维模式从权力政治的陈词滥调中解脱出来，在男性的内在人格与精神品质层面重新审视男性气质。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男性气质作为一门显学的学术合法性终于得到认可；正如康奈尔所言，“在说英语的国家中，虽然男性气质是一个由来已久的话题，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得到学界的认可” (Connell: 7)。其中，“支配性男性气质” (hegemonic masculinity) 概念的提出对男性气质作为一个正式研究领域的确立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康奈尔等学者看来，一个社会同时存在多种形态的男性气质，但总有一种男性气质模式被主流社会和文化所推崇，这就是支配性男性气质，又被称为霸权性或主导性男性气质，这种男性气质模式与权力密切相关。根据权力的动力学机制，罗斯林·阿普比 (Roslyn Appleby) 认为，“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语境中，支配性男性气质定义了那些在成功地‘造就一个男子汉’的过程中所最受称颂的或最令人满意的行为方式，这也无形中认定了其他男性风格和特征的不恰当性和劣等性” (Appleby: 15)。在西方白人社会，支配性男性气质往往属于那些“年轻的、已婚的、白皮肤的、都市的、北方的、异性恋的”男性，他们“信仰新教并且有着父亲身份，受过大学教育，有一份全职工作”，而且“肤色健康、体重标准、身材高大并且最新体育赛绩良好” (Goffman: 128)。这意味着西方白人社会按照种族、年龄、性取向、地域、宗教信仰、婚姻、教育、工作、体貌等因素对男性进行了等级划分。

根据这种对男性的权力等级秩序划分，康奈尔将与支配性男性气质同时存在的其他类型的男性气质称为“从属性男性气质” (subordinated



masculinity)、“共谋性男性气质”(complicit masculinity)和“边缘性男性气质”(marginalized masculinity)。这显然是一种共时性的分类方式。虽然这种划分方式在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争议,被认为结构僵化,无法解释后现代、后结构主义时代男性气质的“多元性和操演性”(Appleby: 16);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提出以及四种男性气质类型的划分对于男性气质研究的发展功不可没,意味着男性气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进入了新的阶段。

除此之外,学者们还从历时的角度对西方主流社会支配性男性气质进行了分类。根据胡佩尔的归纳梳理,支配性男性气质主要有四种理想类型:“希腊公民—勇士模式”(the Greek citizen-warrior model)、“家长式犹太—基督模式”(the patriarchal Judeo-Christian model)、“荣誉/惠主模式”(the honor/patronage model)和“新教徒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模式”(the Protestant, bourgeois-rationalist model)(Hooper: 43-44)。其中,希腊公民—勇士模式的男性气质集军国主义(militarism)与理性主义(rationalism)于一身,并且在自由言论和国家政治等传统男性场域将男性气概等同于公民身份。相比之下,家长式犹太—基督模式的男性气质理想则更具家庭色彩,强调责任、所有权和圣父的权威性等因素。荣誉/惠主模式的男性气质是一种贵族式的男性气质理想,看重男性之间的私人关系纽带、战场上的英雄气概以及敢于冒险的勇气,并且把决斗看作对男性气概的终极考验。新教徒的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模式将竞争性的个人主义、理性以及自我控制或自我否定理想化,把养家糊口者和一家之主的受尊敬地位与他们在公共生活中精于算计的理性结合起来(65)。

然而这些支配性男性气质的社会和文化地位具有鲜明的时代特性,并随着社会权力结构的改变而改变。比如,“尚武的男性气质在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盛极一时,但在中世纪则失去了地位”(Hooper: 65)。在中世纪,权力落入僧侣阶层,于是犹太—基督模式的男性气质成为该社会的支配性男性气质。而在现代社会,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社会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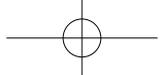


位的提升，这种犹太—基督模式的男性气质又被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模式的男性气质所替代。在当今的消费时代，这种资产阶级—理性主义模式的男性气质又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尽管如此，以上四种支配性男性气质为不同时代的男性气质提供了模板和参照，其要素渗透到所有时代的支配性男性气质之中，使它们具有了某些共性，成为一种持久不变的本然性存在。以上学者对男性气质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考察为男性气质的深入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和深化作用。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男性气质研究已成为独立的研究领域，成为西方性别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关注男性的自然和社会属性、男性与女性间关系以及男性与父权体制的关联等”（陈兵，2018：168）。其中，康奈尔于1995年出版的《男性气质》（*Masculinities*）可以说是标志着这一研究领域正式确立的奠基之作。自此，酝酿和积蓄已久的学术能量和潜力得到充分的释放，相关的论文和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有关男性气质的书籍已居畅销书之列，电视脱口秀节目在大谈男性气质，并且探讨男性气质的会议、‘男人集会’以及报道也成倍剧增”（康奈尔，“前言”：1）。

在研究方法和视角方面，男性气质研究也逐渐走向学术化和规范化，除了民族志的田野调查外，“男性气质研究还通过生活史访谈、大规模的问卷调查、历史学家对文献的耙梳以及媒介分析家对大众文化的观察得以展开”（Connell：7）。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对男性气质的实证性研究开始从后结构主义思想中汲取营养，开始探讨男性气质的话语建构问题”（7）。男性气质研究也不断从不同的学术领域获取思想资源，具有明显的多学科性和跨学科性。到目前为止，社会学、文学、历史学、文化学、传播学、心理学、政治哲学等学科领域的诸多一流学者均参与了这一话题的研究，并为该研究领域的丰富和拓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研究内容方面，所探究的话题也逐渐深入。除了性别暴力等现实问题之外，还“涉及男孩的教育、男性的健康、战争与调停、帝国主义以及政治变迁等问题”（Connell：6）。对于康奈尔而言，“男性气质研究不仅



关乎个人，还涉及蕴含着男性气质的整个机构，这些机构在社会秩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包括国家、安保服务、公司、商品和资本市场”（6）。学者们甚至意识到了男性气质与现代性的内在关联性：“与男性气质研究相伴而行的是对男性气质的本质以及男性气质与现代性关系的理论性争论”（7）。另外，男性气质与经济的关系也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几年时间，商业中的男性气质研究逐渐多了起来，这也让我们更好地了解经济在性别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6）。这一点在商业广告中尤为明显。实际上，男性气质一直都是商家推销产品的一张王牌，从汽车、服装到男性化妆品行业都是如此，甚至可以说，男性气质已经成为一种经济。

男性气质研究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到八十年代正式成为一个研究领域并成为一门显学，再到九十年代逐渐成熟，其后持续发展，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根据康奈尔2014年的统计结果：

如果我们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输入masculinity（男性气质）或masculinities（男性气质的复数形式）两个主题词，就会立刻搜到4840篇论文，这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虽然男性气质研究不算一个庞大的研究领域，但却是一个有着重大意义的跨学科研究领域，已经具备丰厚的知识储备，且仍在发展壮大。（Connell: 7）

在著作方面，以masculinity、manhood和manliness为主题词的研究专著更可谓汗牛充栋，不可胜数。

然而受极端女性主义思维模式的影响，当今的男性气质研究质疑大于肯定，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这种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不仅无法给人们提供较为辩证和全面的认知图景，甚至违背了历史事实和社会常识；长远来看，也不利于男性气质的改造和重塑，并使这一话题研究的社会价值大打折扣。一方面，男性气质是流淌在各个国家和民族文化血液中的一种性别观念和意识，无论我们承认与否，都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从广义上



讲，生之为人就要遵循一定的规范，扮演一定的角色，而男性气质则是这些规范和角色在性别意义上的具体化规约和实践，是社会和文化赋予男性个体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对男性思想和行为的约束和监督。因此，若只因为男性气质，尤其是现代男性气质存在各种问题就对它全面否定，甚至欲除之而后快，不过是一种简单粗暴和懒惰的做法。真正负责的学术态度和建设性的研究是找到这些问题的根源，从学理上提供解决方案和应对危机的出路。因此，要想真正走出男性气质危机，就需要改变以往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跳出男权—女权这一僵化老套的思维模式。这就要求我们以人文精神为观照，以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取长补短，兼容并蓄，实现对男性气质深刻全面的认识，找到走出迷局和摆脱困境的方案。

1.2 男性气质界说

对于这样一个复杂、含混和动态的学术概念，要想给出一个让人满意的确切定义是非常艰难的；只有通过多角度、多层次甚至多学科的分析，才能避免片面和偏颇的理解。不仅要把作为学术概念和常识性理解的男性气质区分开来，还要对相关概念进行细致的分析，并在多学科和话语体系中为之定义。

可以说，男性气质概念的含混性有多方面的原因。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学术态度，不同的时代，甚至不同的学科，都有不同的男性气质价值评判标准、概念选择和研究范式。

第一，价值评判标准的不同。如果把男性气质看作父权制的同谋和男权思想的产物，对男性气质的评价自然是否定性的、批判性的，容易锁定和放大其思想体系中的负面因素，把社会文化中的种种男性气质流俗当作男性气质本身进行批判，从而抹杀男性气质体系中正面积积极的东西；如果